

有限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分析

袁乐平, 王立软, 李萍

(中南大学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以完全理性为假设前提, 难以准确分析当前我国存在的“盲流”“回流”等劳动力流动“异象”问题。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现状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 得出造成劳动力流动异象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有限理性。劳动者的有限理性造成预期成本和收益与实际不符, 进而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决策, 当预期净收益现值与实际净收益现值异号时, 劳动力流动“异象”便会发生。

关键词: 有限理性; 劳动力流动决策; 劳动力流动“异象”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5-0136-05

劳动力流动理论源于刘易斯, 后经费景汉、拉尼斯的发展, 形成经典的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1,2]。该模型认为, 在二元经济体系中存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 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传统部门生产率偏低, 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距。托达罗^[3]提出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流动与预期收入有关。他认为只有当预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净贴现值大于零时, 农村剩余劳动力才会向城市转移; 相反, 当这个值小于零时, 劳动力则会从城市流回农村。这些经典理论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 该假设隐含地认为当劳动力从一个行业或地区流动到另一个行业或地区, 在此后的较长时间内就不再流动了^[4], 劳动者的流动是合理的。因此经典理论研究范围集中于合理的劳动力流动, 对非合理流动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异象”并没有涉及, 难以准确的分析当前我国存在的“盲流”“回流”等劳动力流动“异象”问题。劳动力流动理论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背离, 劳动力流动现状向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产生劳动力流动“异象”的主要原因是流动决策错误, 流动决策是否正确主要与预期是否合理有关^[5], 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不合理预期的产生^[5]。本文基于劳动流动“异象”与传统理论的矛盾冲突, 着重于有限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机理加以研究。

一、劳动力流动“异象”

(一)“盲流”现象

“盲流”指的是劳动力盲目流动。据统计, 1961

年社会上的盲目流动人员中农民占 69%, 城镇居民占 8.5%, 下放职工占 2.8%, 学生占 6.1%, 游民小偷占 11.2%, 其他占 2.3%, 这些盲目流动人员以安徽、河南、河北、山东、江苏省为最多。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很多, 但集中于灾荒严重以及知识水平有限造成的盲目跟风。1950 年的淮河流域和 1954 年长江全流域的大水、50 年代末持续三年的水旱灾害造成全国成灾面积的比重最高时达到 68.6%, 最少时也达到 25%。由于工作中的失误或救济不及时, 使得灾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还有一部分农民听信东北、西北等地钱好赚, 因而不安心在家务农, 纷纷外出打工。由于自身水平有限, 他们流动到城市以后一般无长期正式工作, 也非城市企事业单位雇佣的合同工, 其生活无可靠来源, 甚至有一部分人员以乞讨和流浪为生, 成为政府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大量人口集中到大城市和工业建设重点区域, 增加了当地交通和社会综合管理成本, 严重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影响了一些区域的社会稳定, 致使治安恶化和严重刑事犯罪剧增, 对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依据传统理论, 劳动者做出流动决策是基于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 兼顾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盲流”也属于劳动力流动的一种, 但并没有改善劳动力自身的经济地位, 还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二)“回流”现象

“回流”指的是劳动力在很短的时间里, 快速的从一个地方流走又流回。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 由于一线城市高房价、高物价、限购等生活压力持续剧增,

收稿日期: 2012-05-08; 修回日期: 2012-09-04

作者简介: 袁乐平(1962-), 男, 湖南衡山人, 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王立软(1987-), 女, 河南济源人, 中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 李萍(1986-), 女, 湖南岳阳人, 中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

“逃离北上广深, 回乡安放青春”的口号愈喊愈烈, 截止到2010年底, 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一线城市, 到二三线城市寻找工作。据智联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 从2010年7月份到2011年1月份, 求职者选择北京的比例从13%下降到了12%, 选择上海的比例从当初七月份的9%下降至8%, 广州的下降幅度也类似, 而选择南京的比例从6%增加至6.3%, 成都从3.1%增加到了3.4%, 选择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比例在减少, 而选择二三线城市, 尤其是重点二线城市的比例在增加。但是, 一年以后, “逃离北上广深”的浪潮还未散去, 大学毕业生“重返北上广深”的话题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这种大批量劳动力的快速“回流”, 一方面增加了劳动者本身的心理负担和经济成本, 影响了其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对当地就业市场产生压力、破坏了当地的资源配置, 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与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在较长时间内不再流动是相悖的。

(三) “滞流”现象

“滞流”与“流动”是相对的, 指的是劳动力不流动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集中于我国的农村,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尚缺可靠的统计, 据相关学者估计, 目前农村约有1亿—1.2亿剩余劳动力。其中,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构成主要以中年以上的劳动力为主, 约占农村劳动力的16%, 并且多以农业剩余劳动时间的形式存在。与我国农村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对的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带出现“民工荒”现象, 而且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主要原因是发达地区的企业, 特别是外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招工需求主要集中在年轻劳动力, 而且偏重女性。通过层层筛选和淘汰, 能符合企业要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有限的, 不符合的占绝大的比例。一方面, 大量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制约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 工业部门通过提高工资水平依旧不能得到合适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剩余与短缺并存, 这种现象与传统理论提出的只要存在利益位势差就会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直到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是冲突的。

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单纯分析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而我国目前既存在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也存在与传统理论相悖的劳动力流动“异象”。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 使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缺乏理论依据, 同时劳动者也无法清楚的了解如何尽量规避不合理流动, 会造成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异象”长期存在, 制约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阻挠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因此, 分析劳动力流动“异象”产生的根源, 从而规避“异象”的产生势在必行。

二、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

西方经济学中所假设的理性人, 就是个人、企业、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合理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是赫伯特·西蒙认为, 这种对理性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 使得经济行为者不可能掌握全部的备选方案, 进而造成人不能把所有的价值统一于效用价值, 因此, 人是有限理性的^[6]。有限理性包括“理性不能”和“理性不为”两种^[7], 在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 这两种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有限理性, 下面着重于对其加以研究。

(一) “理性不能”在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的表现

“理性不能”是指: 个体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 加上外界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 个体虽欲达到完全理性, 但却力不能及, 这就是“理性不能有限理性”^[7]。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和外界环境不确定性是造成“理性不能有限理性”的最重要原因。人的认知能力包括人的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情绪等, 由于其固有局限, 造成人知觉出现偏差、接受信息有限、情绪出现偏差以及偏好有差异等; 外界环境不确定性造成环境复杂化和信息海量。

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为:

$$Y = \sum_{t=1}^T \frac{B_{jt} - B_{ot}}{(1+r)^t} - C$$

其中, Y 代表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现值; B_{jt} 指的是在 t 年内从新工作(j)中所获得的效用; B_{ot} 指的是在 t 年内从原来的工作(o)中所获得的效用; T 为在新工作 j 上预期的工作时间 (用年计量); C 为流动过程中所造成的效用损失 (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 r 为贴现率^[8]。当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现值大于零时, 劳动者就做出流动决策; 反之, 净收益现值小于或等于零, 则劳动者做出不流动决策^[9-11]。

目前我国缺乏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机制, 再加上环境复杂化和信息海量, 信息传递迟缓、覆盖面小、范围窄, 劳动力获取信息较少。同时, 由于人脑生理结构的限制, 人类接收信息的能力有限, 接受信息少。劳动力在进行决策时, 由于信息不全而只能考虑一部分的成本和收益。再加上人考虑问题出现的情绪偏差、知觉偏差和偏好偏差等, 考虑到的成本

和收益会受到情绪、知觉和偏好的影响而产生系统性的偏差。那么,由于劳动力的“理性不能”造成 B_{jt} 、 B_{ot} 和 C 与实际不符,“理性不能”在劳动力流动中表现可以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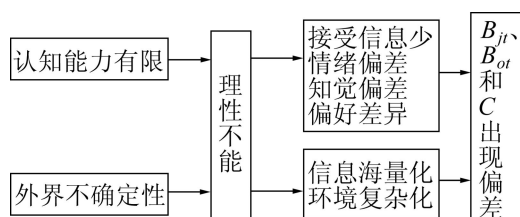


图1 “理性不能”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表现

(二)“理性不为”在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的表现

“理性不为”是指:在有些情况下,即使个体认知能力可以实现完全理性,外界信息是完全的,但是决策者为了提高决策效率、节约心智资源而选择采用有限的理性,利用自觉推理、采用各种启发式等,希望能够以最少的付出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就是“理性不为有限理性”^[7]。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2]指出,决策者通常会采用低成本的、简单的启发式来做出决策,这些决策方式往往会导致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锚定与调整偏差以及框定依赖等系统性偏差。

“理性不为”在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的表现分为两个方面:①“理性不为”导致预期成本和收益与实际成本和收益不符。由于未来工作的经济和非经济收益是预期值,以及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成本的度量具有困难性,劳动力在衡量这些成本和收益时,往往依据“经验法则”,根据一个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或者相似的事务来评估产生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等偏差,从而造成 B_{jt} 、 B_{ot} 和 C 与实际成本和收益不符。②“理性不为”导致预期净收益现值出现偏差。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中可以发现,在计算净收益现值时,需要把成本和收益用统一的度量单位—效用来衡量。由于缺乏一个客观、实际的测度标准,结果往往与实际不符。另外,在计算净收益现值时需要把未来几年的收益差值计算为净收益现值,算法过于复杂,工作量大而繁琐。同时,我国劳动力流动人群中有一部分为农民,他们教育程度偏低。面对这样的问题,个体的理性肯定是有限的,从而造成预期净收益现值 Y 出现偏差。“理性不为”在劳动力流动中表现可以用图2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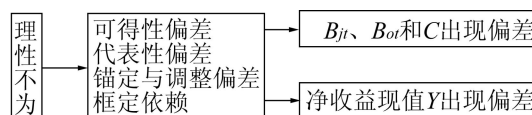


图2 “理性不为”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表现

三、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析

(一)完全理性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析

劳动者的完全理性包括以下隐含内容:①不存在不确定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劳动者也可以预知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②劳动者具有可以确定的效用函数,同时具有同质性以及一致性的偏好体系;③劳动者具有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④劳动者可以设计出所有的备选方案以及精确预测各项方案所产生的后果;⑤劳动者可以确定地赋予每项行为结果一个具体的量化效用;⑥劳动者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在上述条件下,劳动者总是在合理的做出劳动力流动决策,能从所有可能的行动中选择最好的一种,劳动者的决策永远是准确无误的。因此, B_{jt} 、 B_{ot} 和 C 与实际是相同的,同样的由于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净收益现值 Y 与实际也是相同的,劳动者根据净收益现值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劳动者是否流动都是合理的。完全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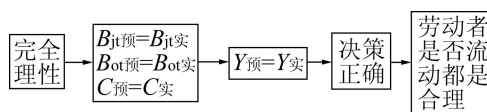


图3 完全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图

(二)有限理性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析

由于有限理性分为“理性不能”和“理性不为”两种,因此在对有限理性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进行分析时,需要从“理性不能”和“理性不为”两个方面加以研究。

1.“理性不能”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析

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理性不能”使得 B_{jt} 、 B_{ot} 和 C 与实际不符,进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 $(B_{jt}-B_{ot})$,造成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现值 Y 可能会出现偏差,从而影响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由于从事原有工作 (o) 时间较旧,为了证明的需要,假定 B_{ot} 与实际相同。“理性不能”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析如下:

$\because B_{jt} \neq B_{jt}^{\text{实}}, C \neq C^{\text{实}},$

Y 与 B_{jt} 正相关, 与 C 负相关

$\therefore Y_{\text{预}}$ 与 $Y_{\text{实}}$ 的关系为: $Y_{\text{预}} = Y_{\text{实}}$ 或 $Y_{\text{预}} \neq Y_{\text{实}}$

$\therefore$ 当 $Y_{\text{预}} = Y_{\text{实}}$ 时, 劳动者决策正确, 即合理的劳动力流动。

$\therefore$ 当 $Y_{\text{预}} \neq Y_{\text{实}}$ 时, $Y_{\text{预}}$ 与 $Y_{\text{实}}$ 的关系为: $Y_{\text{预}}$ 与 $Y_{\text{实}}$ 同号或者异号

若 $Y > 0$, 则劳动力流动; 若 $Y < 0$, 则劳动力不流动。

$\therefore$ 当 $Y_{\text{预}}$ 与 $Y_{\text{实}}$ 同号时, 劳动力流动的决策正确; 当 $Y_{\text{预}}$ 与 $Y_{\text{实}}$ 异号时, 劳动力流动的决策错误。

$\therefore$ 当 $Y_{\text{预}}$ 与 $Y_{\text{实}}$ 异号时, 有两种情况: $Y_{\text{预}} > 0, Y_{\text{实}} < 0$; $Y_{\text{预}} < 0, Y_{\text{实}} > 0$

“盲流”“回流”是 $Y_{\text{预}} > 0, Y_{\text{实}} < 0$; “滞流”是 $Y_{\text{预}} < 0, Y_{\text{实}} > 0$

$\therefore$ 当 $Y_{\text{预}} > 0, Y_{\text{实}} < 0$ 时, “盲流”“回流”异象产生; 当 $Y_{\text{预}} < 0, Y_{\text{实}} > 0$ 时, “滞流”异象产生。

2. “理性不为”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析

与“理性不能”相同的是, “理性不为”同样使得 B_{jt} 、 B_{ot} 和 C 与实际不符, 间接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除此之外, “理性不为”造成预期净收益现值 Y 出现偏差, 直接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同时, 在

分析“理性不为”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时, 仍然假定 B_{ot} 与实际相同。由于与“理性不能”证明过程相类似, 此处不再证明。“理性不为”对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如图5所示。

通过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的对比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 利用有限理性分析劳动力流动并非全盘否定传统的完全理性, 而是放大了传统理论的研究视角。有限理性下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 将劳动者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更改为有限理性, 使其既能分析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又能分析非合理流动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异象”, 提高了劳动力流动理论的解释能力。

四、结论

我国劳动力流动存在“盲流”“回流”和“滞流”三种“异象”。本文从有限理性的视角对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进行了分析, 解决传统理论的研究视角中只能解释劳动力合理流动而不能解释“异像”流动的矛盾, 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异象”流动归集到一个框架中研究分析, 并作出合理解释。劳动力流动存在“异象”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包括“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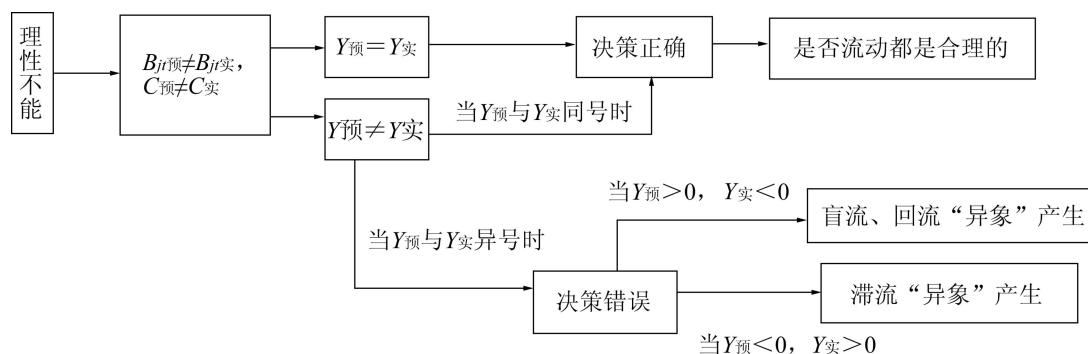


图4 “理性不能”对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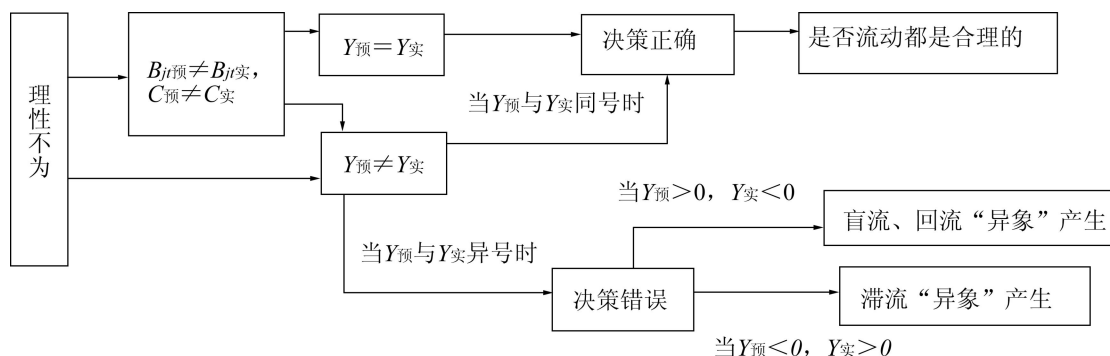


图5 “理性不为”对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图

性不能”和“理性不为”两种。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理性不能”影响劳动者对预期成本和收益的判断，并使其相对于实际出现偏差；“理性不为”则不仅造成预期成本和收益出现偏差，更影响净收益现值。而预期成本和收益决定净收益现值的大小，直接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当预期净收益现值与实际净收益现值异号时，劳动力流动产生就产生“异象”；当同号时，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如何规避有限理性造成的偏差则是以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 [1] 威廉·阿瑟·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 北京: 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145-149.
- [2] 费景汉, 拉尼斯. 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 耶鲁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出版, 1964: 43-52.
- [3] Harris J R, Todaro M.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1): 126-142.
- [4] 熊军红. 劳动力流动模型的演化[J]. 天中学刊, 2008, (8): 38-41.
- [5] 郭新强, 盛宇华. 有限理性决策选择性预期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J]. 学术论坛, 2011, (8): 63-69.
- [6] 赫伯特·西蒙. 管理行为[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4: 67.
- [7] 张学军. 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心理根源探析[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3): 64-68.
- [8] 曾湘泉. 劳动经济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52-153.
- [9] 西奥多·W·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205-208.
- [10] Jorgenson D W.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67(19): 288-312.
- [11] Larry A. Sjaastad.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5): 80-93.
- [12] Tversky A, Kahneman D.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J]. Science, 1974(185): 1124-1131.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on labor flow decision-making

YUAN Leping, WANG Liruan, LI Ping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al labor flow theory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perfect rationality, which cannot acutely analyze the heteromorphism problem in present Chinese labor flow such as “unemployed migrant people” and labor backflow. The theory deviates from the real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flict between current situation of labor flow and traditional theory, we conclude that bounded rationality leads to heteromorphism problem. So, we analyze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 of labor flow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cause the expected costs and benefits do not match with the actual, which would affect labors’ decision-making for flow. Labor flow heteromorphism occurs when there is an opposite sign between the present value of expected net income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actual net income.

Key Words: bounded rationality, labor flow decision-making, labor flow heteromorphism

[编辑: 汪晓]